

现代政治经济学

前·沿·译·丛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实证政治 经济学

James E. Alt

Kenneth A. Shepsle

[美] 詹姆斯·E. 阿尔特 肯尼思·A. 谢泼斯——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永钦 薛峰——译

现代政治经济学

前·沿·译·丛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实证政治 经济学

James E. Alt

[美] 詹姆斯·E. 阿尔特

肯尼思·A. 谢泼斯——主编

Kenneth A. Shepsle

王永钦 薛峰——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证政治经济学/(美)詹姆斯·E.阿尔特
(James E. Alt), (美)肯尼思·A.谢泼斯
(Kenneth A. Shepsle)主编;王永钦,薛峰译. —2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现代政治经济学前沿译丛)

书名原文: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ISBN 978-7-208-14649-5

I. ①实… II. ①詹… ②肯… ③王… ④薛… III.
①政治经济学-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4888 号

责任编辑 刘林心

封扉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实证政治经济学

[美]詹姆斯·E.阿尔特 肯尼思·A.谢泼斯 主编

王永钦 薛峰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7.75 插页 4 字数 230,000

2017 年 8 月第 2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649-5/F·2468

定价 52.00 元

致 谢

本书包括了许多 1987 年秋在马萨诸塞州剑桥镇哈佛大学召开的政治经济学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在此对安德鲁·W. 梅隆基金会的资助表示诚挚谢意。接受这一资助的学者包括罗伯特·H. 贝茨、哈罗德·德姆塞茨、道格拉斯·C. 诺思、曼瑟·奥尔森、威廉·H. 赖克、约翰·罗伯茨和戈登·图洛克。本书包括了这些学者的经过修订的研究论文,另外还增加了两篇分别由戴维·M. 克瑞普斯和彼得·C. 奥德舒克撰写的此前还未(以英文)发表过的论文。

在此我们还要感谢哈佛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詹姆斯·汉密尔顿提供大量有益建议,感谢托亚·凯恩克编辑整理了参考书目和其他文稿准备工作。

詹姆斯·E. 阿尔特 肯尼思·A. 谢泼斯
于马萨诸塞州剑桥镇

导 论

詹姆斯·E. 阿尔特 肯尼思·A. 谢波斯

实证政治经济学

实证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产生得益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学科交叉研究的近期发展。实证政治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既有别于政治经济学的规范研究方法,也有别于历史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方法强调对财富和权力分配的价值评价,并根据假设的评价标准来得出最优结果或安排。而历史研究方法则以非理论方式浓墨重彩地描述历史。比较而言,实证政治经济学寻求一般原理和命题,并将实际经验与这些原理和命题相对比,以对实际经验进行理解和解释,而不是评价。另一方面,虽然政治经济学对真实现象极为关注,但是其分析方法明显是理论性的。实证政治经济学的重点是微观基础,而且它是植根于微观经济学的理性人分析方法。因此,实证政治经济学的最显著特点为:一致统一的政治学 and 经济学理论观点,很强的跨学科特性,以及重视解释经验规律。

此外,与独立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相比,实证政治经济学既强调政治过程中的经济行为,也强调市场中的政治行为。对于前者,实证政治经济学使用经济学方法——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和自利主体的策略行为——来解释政治制度的起源和维持,以及公共政策的形成和实施。对于后者,实证政治经济学强调市场现象发生的政治背景。通过重点

讨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如何约束、指导和反映个体行为,实证政治经济学试图以统一的方式解释生产、资源配置和公共政策等社会结果。

简言之,实证政治经济学是在政治和经济制度背景下对理性决策进行研究。它主要分析两个特征问题:在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中,我们所观察到的制度差异是如何影响政治和经济结果的?制度本身是如何受到个体和集体信念、偏好和策略的影响的?实质上,这两个问题是关于制度均衡和均衡制度的。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实证政治经济学既要提供对在各种制度背景下的最优选择的理解,又需要将这些制度背景内生化。

从表面上看,上述两个问题并无新颖之处。但是,实证政治经济学的显著特征就在于它总是认为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关于绩效的。政治学家在研究立法机构时,可能会考察程序规则或委员会权力方面的变化对政策的影响。再举个例子,从历史角度研究国际政治经济的学者可能会考察创建和维护一个国际制度公约的影响或现有国际公约崩溃的影响。在我们看来,政治经济学方法与其他学科方法的重要区别在于,政治经济学方法认识到,制度变化的推动者能够预见制度变化的任何影响,因而这种影响可能成为制度变迁的源泉。也就是说,我们在回答关于制度影响的第一个问题时,实际上也同时回答了(关于制度变迁的)第二个问题。反之亦然。我们可以很自然地认为,那些制度变迁的推动者在试图改变制度时心中是有某个结果的,这一结果(以及其他结果)将出现在制度变迁所造成的各种结果中。在理论上,任何结果都是可以预见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因此,在解释制度变迁时,不考虑预期结果是不合适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坚持同时处理分析两个核心问题。

发展方向

实证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推动力既来自于对新古典经济模型威

力的欣赏,也来自于对新古典经济模型局限性的认识。一般而言,新古典经济模型的结论都来自市场均衡。这些均衡是分散环境下个体之间自愿交易的结果,没有交易成本,也不涉及市场力量或外部性。新古典模型通常不考虑制度,或最多将制度视为自利的最大化行为的某种外部约束或参数。(实际上比较静态研究很少会考虑制度特征。)而实证政治经济学则试图放松某个新古典的核心假定,甚至去掉这样的假定,以便考虑制度的起源和运作。

实证政治经济学研究沿着数个方向发展,这些方向绝不是彼此排斥的。其中一个主题方向主要以涉及集体行动、集体决策,以及集体选择过程、规则、程序的模型来代替纯粹的分权式个体交易假定。本书中由彼得·奥德舒克(Peter Ordeshook)所撰写的一章回顾了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他首先说明了集体行动的逻辑、选举和立法的空间模型以及委员会的决策,然后详细介绍了一些近期的研究,这些研究试图将这些概念纳入到一致的工业化和民主社会中常见的政治过程的理性选择模型中。

另一个研究方向,则考察与市场力量或其他类型竞争市场缺陷有关的环境问题。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回顾了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文献,并形成这样的观点: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未能认识到市场和其他交易领域的实际组织形式,而这正是第三世界政治竞争的焦点。因此,新古典模型不能解释进口替代、劳工补贴和对低效率产业的保护等行为模式,而当政府试图通过控制经济结果来赢得或维持政治支持时,这些模式通常就会出现。

实证政治经济学的第三个主要研究方向,是交易成本分析。交易成本分析舍弃了交易是无成本的新古典假定,认为在发现和利用交易机会时至少可能发生一些正成本。该分析指出,签订完备合约——规定和执行包含经济交易所有方面内容的合约——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于执行和度量的成本很高、人的认知能力有限,以及机会主义行为(以狡猾手段牟取私利)带来的风险。交易成本方法认为,有可能在无摩擦

世界中进行的一些交易实际上是不会发生的。交易成本方法然后描述了对如下制度的追求：这些制度能最大化去除交易成本后的净收益。米尔格罗姆(Milgrom)和罗伯茨(Roberts)所撰写的一章的第一部分对交易成本方法进行了综述，同时还综述了交易成本方法与代理问题、企业的组织，以及机会主义的租金榨取之间的联系。

主要研究成果

本书第一篇回顾了实证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为后续的讨论打下了基础。彼得·奥德舒克介绍了实证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并且在介绍历史的同时否定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说法。奥德舒克着重强调了微观基础，而罗伯特·贝茨则重点关注宏观现象。贝茨尤其关注理性选择范式和实证政治经济学是如何改变了政治和经济发展研究的，尤其是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研究。他还指出，政治经济学将理性选择范式和文化与社会学洞见统一起来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而这一任务一直为理论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忽略。

第二篇主要是博弈论领域的研究发现，以及政治经济学从早期新古典基础中解放出来所得到的研究发现。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和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分析了如下命题：与市场中的个体选择行为不同，组织中的集体行动选择不仅仅取决于交易成本，而且取决于试图影响集体决策所耗费的资源。戴维·克瑞普斯(David Kreps)的那一章写于多年前，这次是首次以英文版的形式出现，该文讨论了基于现代扩展式博弈论的正式组织中的制度。虽然他的讨论主要是针对企业的，他关于声誉和不可预见情形的理论论述可以推广至各种组织。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从自利行为所发生的制度场所(institutional arena)角度比较了企业和政党，并提出一个新颖但具有争议的观点，即这些组织不能仅仅根据代理成本来区分。他认为，组织的区别往往表现在组织中互相竞争的派系，以及这些派系对组织

潜在适宜性(amenity potential)的争夺程度。

每一章都在历史政治经济学研究常用的广泛历史归纳与奥德舒克和贝茨所回顾的微观模型和宏观模型、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以及克瑞普斯所讨论的博弈论原理常用的详细理论推理之间寻得平衡。在每一章的分析中都会有一个突出的微观结构特点:讨价还价和影响成本(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声誉和不可预见的情形(克瑞普斯),以及潜在适宜性(德姆塞茨)。这些特点是理解更一般现象(例如制度形式、制度文化、协调和领导、承诺,以及授权和专业化)的基础。

本书第三篇为在实证政治经济学领域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数位知名学者提供了一个论坛。每一章都集中讨论作为研究项目基础的一个分析单位。威廉·赖克(William Riker)重点讨论了个体决策;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重点讨论了交换交易(exchange transaction);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的重点为剩余榨取(或寻租);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的分析重点则为不可分性。每篇文章都根据自己所选择的分析单位,对实证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要问题和发展方向进行了思考。

本书提供了多个理论视角,这可能使得实证政治经济领域的学者看起来彼此独立,但是我们相信这一领域有着统一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本书收纳的主要理论成果反映了实证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发展趋势,使读者对实证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和不同研究方法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目 录

1 致谢

- 1 导论 詹姆斯·E.阿尔特 肯尼思·A.谢波斯

第一篇 新政治经济学

- 3 第一章 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彼得·C.奥德舒克
- 25 第二章 发展领域的宏观政治经济学 罗伯特·H.贝茨

第二篇 组织、交易和机会

- 53 第三章 谈判成本、影响成本和经济活动的组织 保罗·米尔格罗姆 约翰·罗伯茨
- 92 第四章 企业文化和经济理论 戴维·M.克瑞普斯
- 152 第五章 潜在适意性、不可分性和政治竞争 哈罗德·德姆塞茨

第三篇 对理论基础的反思

- 173 第六章 政治科学和理性选择 威廉·H. 赖克
- 194 第七章 制度和交换的交易成本理论 道格拉斯·C. 诺思
- 208 第八章 特权的成本 戈登·图洛克
- 227 第九章 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观点的统一
曼瑟·奥尔森

- 248 参考文献

第一篇

新政治经济学

第一章 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彼得·C. 奥德舒克

政治过程和经济过程的不可分割是不言自明的。市场受到政府强制制度的规制,并且政府控制着最有效率的交易核算手段——货币——的供给。不管国家的形式如何,只要两个人发现交易是互利的,市场就会长期存在,即使市场的形式比较原始。由此,政治保守派所学到的经验为:政府建立起市场运行环境,并随时准备干预,防止特定的市场结果出现。人们不仅仅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他们还是各个政治体中的公民,这些政治体不仅能规制市场,而且还能直接剥夺应由市场进行配置的资源。相应地,如果不预测各个市场结果会导致的政策反应,也就无法对市场结果进行预测。另一方面,左翼,特别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初级形式(cruder forms),也学到了如下经验:无论一个国家采取什么制度结构,控制市场力量的基本法则是不会消失的——供求力量的互动是不以文化、种族、社会化模式、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为转移的。

根据上述观点,经济学和政治学被划分为两个独立学科颇使人有些惊讶,而且这两个学科的联合研究还面临如下阻碍因素:大学不同系科的划分、学术杂志的专业化分类、政治科学的常用研究模式与经济学的模式迥异。实际上,我们甚至不能说这两个学科是相互促进的。政治学科受到了许多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学和心理学)学术思潮的影响,包括有利的影响和不利的影 响。不管怎样,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必将打破彼此的界限。一些学者将这种交叉融合视为“经济理论的帝国主义”。我们认为,这种交叉融合只是之前统一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范式自然演进的结果,只不过经济学家在 20 世纪早期通过摆脱现实对理论发展造成的诸多束缚,进行了些许改进。虽然理性选择范式在政治

学科中可能没有居于支配地位,但却是最显著的一个研究范式。今天看来,理性选择范式继承了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行为主义革命,因此我们有理由预期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能够再次全面融合。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能很快看到大学学科界限的消亡。繁琐缓慢的行政程序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但是政治学学者和经济学家并不总是分担这种忧虑。然而,一个学科的实践者能够忽视另一个学科的理论发展和理论问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重新出现,并且已经形成了大量统一规范的数理文献,这表明理论研究已经开始重新发展一个改进的范式,使其包括经济学家为方便理论建模所抛弃的一些现实因素。政治学则正是经济学家所抛弃的一个现实领域。虽然我们也对这一做法感到遗憾,但是经济学却由此得到了自由发展。经济学家只需要研究分权的市场和货币的配置,从而揭示了范式的精美细节。他们发展了选择和偏好的公理体系,并对偏好和其他选择背景进行了正式描述。经济学家受到非经济学学者(比如萨维奇和冯·诺伊曼)的巨大影响,将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进行了拓展,从而能够揭示偏好、主观概率和互动选择的深层结构。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的分离反倒促成了抽象理论的产生,特别是形成了最有力的社会理论——古典微观经济学。

因为理性选择范式的数学模型最初出现在微观经济理论中,如果政治学学者也采用这样的分析模式则似乎支持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观点,而不仅是学科合作或学科交叉。也就是说,由于经济学家的研究范式已经超出了最初的领域范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就呼之欲出了。即使我们不同意上述说法,基于的理由是许多政治学学者的学术作品中已经使用了理性选择范式,其中包括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ey)、戴维·杜鲁门(David Truman)、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查尔斯·林德布罗姆(Charles Lindblom)以及 V. O. 基(V. O. Key),经济学帝国主义仍然有其支持依据:政治学学者虽然使用了经济学范式,但却没有引入经济学

的严格逻辑推理。另外,今天广泛的跨学科研究始于阿罗(Arrow)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和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这一时期产生了四大原创性理论著作: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的《委员会和选举的理论》(1958)、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的《民主的经济理论》(1957)、威廉·赖克(William H. Riker)的《政治联盟理论》(1962),以及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的《同意的计算》(1962)。今天,由这些理论著作激发的研究发表在各种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主流期刊上。相关的文章、书籍和工作论文可谓汗牛充栋,让人目不暇接。随着这股潮流,理性选择范式对政治科学的影响已经是十分明显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越来越多的政治学期刊论文要么明显扩展了理性选择范式,要么就以该范式为研究理论背景。此外,“正式的政治理论家”和“实证的政治理论家”这样的称谓并不是用来称呼仅仅使用数学工具的政治学学者的,而是用于那些使用理性选择范式进行研究的学者。然而,在上述开创性理论贡献者中,也只有威廉·赖克可被称为正式的政治学学者,同时有人提出经济学具有帝国主义特性,正在取代政治学。

以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一观点作为背景,本章主要谈三个主题。首先,如果经济学具有帝国主义倾向,那么这种帝国主义也仅仅是18世纪和19世纪社会学理性主义范式的再一次进行整合。这种所谓的帝国主义,只是使经济学模型和定律在很初级的层次上进入政治科学。更一般来说,政治学学者只是再次明确使用一个在很久以前就将政治学和经济学整合在一起的理论范式,只不过这个范式已经由经济学家在过去的七十五年里不断加以完善罢了。第二,现在出现的理论架构不仅仅保证对政治程序的建模分析有一个综合的基础,而且将政治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整合在一起。最后,这一理论范式也存在着基本缺陷,政治学研究中已经显现了许多这样的缺陷。尤其值得关注的不足,在于策略性和合作行动的分析方面。博弈论作为范式的一部分,主要

用于分析策略性和合作行动。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博弈论沉寂了多年,现在才得到大力发展。后面,我们将说明政治科学对博弈论的发展作出了怎样的贡献(因为博弈论所研究的各个特殊问题与几乎所有政治程序都有共同性)。

学科渗透面临的早期阻力

理性选择范式是建立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个人都是自利的这一假定之上。尽管围绕理性选择范式的细节有着不断的猜疑、批评、辩护和形式变化,该范式仍然是连接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纽带。虽然将理性选择范式改编应用于政治过程的研究通常被作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证据,我们往往倾向于指出这一帝国主义只是一种错觉。毕竟,即使一些政治学学者的论文缺乏经济学家的严格数学论证,我们仍然可以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这一范式的存在。这些政治学学者包括本特利、达尔、基、摩根索和杜鲁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学家只是贡献了数学模型分析。我们还应当注意政治学学者并不是都遵循布莱克、唐斯、赖克、布坎南和图洛克的研究路线,并且他们在几十年里忽视了阿罗的不可能定理的影响。遵循行为主义传统以及受心理学和社会学影响较多的学者最容易对理性选择范式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对理性这个概念的定义太局限了,而且自利的概念排除了其他的行为动机,比如利他主义。他们还认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假说使得人们无法研究与群体有关的问题,比如社会化、准则和文化。此外,公共政策和外交领域的学者将理性选择范式的正式建模分析和为建立数理模型分析而作出的各项假设视为理解自己领域问题的大敌。因此,理性选择范式在政治科学中的明确应用往往局限于一些学术会议,会上有专门的正式政治理论、数学模型或者公共选择方面的专题讨论。在20世纪60年代以及70年代的早期,理性选择范式的支持者才偶尔聚在一起讨论一些传统议题,例如立法程序、选举、领导任期、国际事务、法庭或公共政策